现有日本汉诗史对幕末明初日本汉诗转型的书写

对于明治时代汉诗在日本汉诗中的位置，现有的日本汉诗史著作都一致地认为，这是日本汉诗衰微的时代。从江户到明治，日本汉诗史从高峰到式微，其原因为何？

菅谷军次郎《日本汉诗史》并未详述其中原因，但从他的叙述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对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在第八章“明治时代”的开篇只言，在这个“一切都改头换面的光辉灿烂的时代”，传统的和文、汉籍成为了西方文化的配角，不为人所重视，汉诗也因此衰微（日本汉诗史，351）。

和菅谷军次郎的叙述相比，中国的两部日本汉诗史对幕末明初的诗风转型原因的探求更为明确。

《日本汉诗发展史》强调，幕末的尊皇攘夷运动埋下了日本汉诗诗风转型的伏笔。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感时忧国的志士之作（71）。而尊皇攘夷运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西方国家在东亚地区的殖民扩张与日本发生的摩擦逐渐升级，如文化5年（1808年）英国军舰伪装成荷兰船只进入长崎港、文化8年（1811年）沙俄军舰舰长格罗宁在国后岛被拘捕等事件。日本和西方的冲突，使得汉诗成为日本民族志士抒怀的载体。

《近世东亚汉诗流变》也提到，德川幕府的腐败政治、日本和西方的军事摩擦，日本的国内矛盾最终在美国黑船的强力叩关下爆发（428）。幕末倒幕志士，以及明治初期诗人的汉诗创作，特别是七言绝句中体现的刚健之气和民族忧患意识成为了日本汉诗史发展到明治初年时的新主题。

可以看到，《日本汉诗发展史》和《近世东亚汉诗流变》都注意到幕末明初的风云巨变对日本汉诗诗风转向的影响。尽管在这两部汉诗史的书写中，作者在交代各个分期时代背景的同时，尽可能地突出日本汉诗发展的自律性因素和规律，但这种汉诗史观无法解释日本汉诗从高峰步入衰落的趋势。这意味着，日本汉诗史发展中的自律性动力在幕末明初失去了解释效力，使得日本汉诗史的书写者必须借助以尊皇攘夷运动为中心的

以尊皇攘夷运动为中心的一系列文学以外的事件，才能构建出一种从近世到近代日本汉诗史的合理逻辑。

如此我们可以认为，以尊皇攘夷运动为中心的事件，在现有日本汉诗史的书写中是特殊的。在它们的构建中，这一系列事件既是推动日本汉诗史的外部动因，又是汉诗这一文体自律发展的直接原因。而文教、世风、汉籍输入等因素对日本汉诗史的影响和这一事件相比，它们贯穿于日本汉诗史的始末，其特殊性就不如后者。